

陶德麟

自选集

Tao Delin



理论文库

学习出版社

陶德麟自选集

TAODELIN ZIXUANJI



理论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德麟自选集/陶德麟著. (“学习”理论文库)

-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147 - 0048 - 0

I. ①陶… II. ①陶… III. ①社会科学 -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8751 号

陶德麟自选集

TAO DELIN ZIXUANJI

陶德麟 著

责任编辑: 李 岩

技术编辑: 王晓勇

出版发行: 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B 座 11 层 (100062)

010 - 66063020 010 - 6606163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7 25

字 数: 34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7 - 0048 - 0

定 价: 77.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代序：在哲学探索之路上行走^{*}

我走上哲学之路，并不是自我设计的结果。

我没有上过小学。12岁以前在家里读书，老师是我的父母，还有父亲的朋友陈炳文先生和杨相霖先生。除了学习英语和算术，我读完了“四书”，读了《诗经》、《左传》、《古文观止》的一部分和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学了诗词格律，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聊斋志异》，爱好书法和京剧。抗日战争的中期，我在湖北的战时省会恩施考进了实验中学。那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校长和老师很强，教风学风很好。我对文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兴趣很浓，想将来做文学家或科学家。抗战胜利后我随实验中学迁回武汉，升入高中，才开始接触一点哲学。这一方面是因为语文老师贺良璜先生教我们读了一些诸子百

^{*} 原载2010年4月13日《光明日报》第11版。本书所载为作者1978年以来发表的部分论文。大体按所论问题归类，各类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为体现作者的认识过程，各篇除必要的删节外均保持原貌；引用经典著作亦按当时版本。

家的文章，要我们用文言文作文，我写过一些论孔孟荀韩哲学思想的短文；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状况不满，而听了胡适、张君勱等人的讲演又觉得非常失望。这时我和一些同学组织了读书会，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思想方法论》和武汉大学地下党领导的社团秘密印刷的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朦胧地知道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觉得这些新道理对观察现实大有帮助。1949年武汉解放时我正好高中毕业报考大学，被清华大学外文系、武汉大学经济系和华中大学外文系同时录取，进了武汉大学经济系。在学期间我选修或旁听了数学分析、普通物理、逻辑、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文艺学、社会学。其中刘绪贻先生讲授的社会学用的教本是李达同志的名著《社会学大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又相继学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解得稍多一些了，产生了兴趣。1953年2月李达同志来武汉大学任校长，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时我是四年级的学生，奉派为他整理讲课记录。他第一次同我谈话就以父辈的深情长谈了他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的经历，谈到许多为人治学的道理，希望我终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久我毕业留校，成了他的学术助手和学生，并在哲学系任教。从此哲学研究就成了我的终身职业。

我开始走进哲学领域时非常幼稚，对这个浩瀚的海洋懵然不知深浅。在李达同志的指导下，我努力弥补知识缺

陷，自学了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外哲学史和逻辑，有较快的长进。李达同志放手让年轻人讲课，我25岁时开始在哲学系任教，也开始发表论文。1961年毛泽东主席请李达同志编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时，李达同志指定我为主要执笔人，在5年的时间里我受到了强化锻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有了初步的掌握，信仰也更坚定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到来，李达同志被迫害致死。我也在劫难逃，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10年的惨苦经历迫使我不断地思考，精神上的痛苦远远超过肉体上的折磨。我被迫学习当时权威理论家们宣传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却让我越学越无法理解：一方面讲“实事求是”，一方面又制造大批的冤案；一方面批英雄史观，一方面又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一方面讲认识需要在实践中多次循环往复，一方面又说领袖能“洞察一切”，“句句是真理”；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一方面又说在我们这里已经到了“顶峰”；一方面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一方面又鼓吹精神万能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如此等等。我痛心地感到祖国正处在误入歧途的险境。但我相信中国不会就此沉沦。1974年我偷偷写下的一首小诗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但“两个凡是”等于

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路线方针还是不能触动。1977年9月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了纪念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40周年的研讨会。大家劫后重逢，说不尽千言万语。议论的中心集中到一点：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持续10年之久？怎样才能防止畸形历史的重演？我们的共识是：“文化大革命”是有理论支撑的，它的最深层的理论基础就是在检验真理的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偷换了实践标准，根本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搞乱了全国人民的思想。“两个凡是”就是这一谬误的继续。不从哲学上驳倒这种谬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不可能正确解决。我从来没有如此痛感哲学与民族的兴衰、人民的祸福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但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政治栅栏非常艰难。在一批同志坚忍不拔的努力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了，打响了冲破“两个凡是”的第一炮。7月我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赴北京参加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作了大会发言，并发表了几篇批驳“两个凡是”的论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之后，才解除了政治上的巨大压力。

此后的30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系当代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上。我深感自己是一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波涛汹涌的哲学大海里乘桴而行，无异以蠡测海，所见之微自不

待言。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然而我并不怨悔。将近60年的生涯中我的主要体悟有如下几点：

(1) 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容易使人觉得它远离实际生活。中国传统哲学还因为“过分”关注人事而为某些西方哲学家所诟病。其实，哲学的根源还是实际生活。哲学家谈论的问题尽可以上干云霄，但还是摆不脱尘世的土壤。正是实际生活的需要推动着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几十年的经历使我坚信，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不是理性神坛的供品，而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是人对自身处境的思索、理解和追求，是高耸云霄而又普照现实的阳光。哲学与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祸福息息相关。哲学对一个民族尤其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尽管任何哲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为万世开太平”，但哲学家不可无此情怀。有了这种情怀，才可能以“九死无悔”的精神去“爱智”。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才是哲学家应有的境界，也是我督促自己的箴言。

(2) 哲学是人类的共同的思想财富，没有国界；然而哲学又不能没有民族特点。不与民族特点融会契合的哲学不可能在这个民族生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实现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华民族

自己的哲学。黑格尔当年说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① 我们也必须“教给哲学说中国话”。正因为八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才在中国的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3) 学风和文风至关重要。创新是一切学问的生命，但创新必须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哲学不是实证科学，最易流于空泛，然而也最忌空泛。在哲学领域里，要分析清楚一个问题，把理论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都是非常艰难的精神劳作。许多大哲学家用了毕生的精力也只回答了几个哲学问题。大言空论则非常容易。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用一大堆抄来的或生造的语词来“讲”自己也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把症结蒙混过去，尽快地构成体系，我以为不可取。文风上也要力求精密显豁。个人当然应该有各自的风格，不能规定模式，强求一律；何况语言本身也在发展，并无一成不变的定格。但中国语言毕竟有相对恒定的因素，不宜置之不顾。中国人写文章还是应该说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话。恕我直言，现在有的文章很像用汉字写的洋文，艰深晦涩，佶屈聱牙，不知所云。我以为也不可取。

① 苗力田编译：《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苏轼当年曾批评扬雄“以艰深文浅陋”，认为“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语虽尖刻，却有至理。把深刻的道理表述得准确晓畅，才是高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都离不开优良的学风和文风。

(4)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站在思维的制高点，正因为它吸纳和消化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又有所超越。今后要发展，仍需如此。要有自己的立场，但却不可偏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要精细地分析总结，既不可盲目崇拜，也不可盲目拒斥。

(5) 哲学和任何其他学问都不能互相代替，也都不是万能的。哲学要做自己应该做和做得到的事情，不可越俎代庖，不可自以为至高无上，也不必因为受到冷遇而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哲学的性质注定了它难免做黄昏起飞的枭鸟，也就是“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做高鸣报晓的雄鸡，做“事前诸葛亮”。要做好“事前诸葛亮”，先得老老实实在地做好“事后诸葛亮”，否则就不免流于空谈，热闹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

目 录

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	(1)
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	(16)
实践怎样检验认识?	(39)
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 ——答客问	(60)
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75)
参加 1978 年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前后后	(86)
百家争鸣与“两家”争鸣	(106)
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	(115)
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	(128)
两种伦理原则	(143)
道德观念要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158)

试论我国改革实践对人们的思想影响	(175)
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	(188)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202)
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几个理论问题	(215)
改革需要哲学 哲学需要改革	(235)
哲学专业教学改革管见	(264)
中国当代哲学的回顾与展望	(278)
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点杂感	(291)
关于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访谈	(297)
从马克思的两段话说起	(316)
从新中国成立 50 年的历程看哲学的作用 ——兼论三个“标准”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	(327)
关于社会科学的几个问题	(349)
为人·为学·为文	(365)
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 ——读毛泽东同志致李达同志的三封信	(36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	(37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前提性问题	(384)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	(401)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 ·····	(413)
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篇 大文章 ·····	(446)
正确汲取中国古代和合思想的精华 ·····	(459)
论辩证法与和谐问题 ·····	(465)
建党前后的李达同志 ·····	(482)
杰出的中国哲学家李达 ·····	(516)

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过多次明确论述的，本来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却成了陌生的命题，甚至被有些人说成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如不解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将无从起步。这是关系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问题。现在还有如此重大的分歧，当然不能不通过讨论正本清源，分清是非，求得共识。本文仅就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 本文是作者1978年7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全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上的大会发言。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1978年《哲学研究》第10期只发表了此文的第三部分，题为《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此次收入本书时恢复了全文。

一、在实践标准之外另立真理标准是理论上的倒退

真理问题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古今中外各派哲学都有关于真理的学说，可谓千姿百态。但有两大问题是各派哲学都不能回避的：真理的定义问题和判定（即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只有弄清了某派哲学对真理所下的定义，才可能懂得它讲的真理标准是什么涵义。各派哲学的真理定义各持其说，如符合说、融贯说、效用说等等。与此相应，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有多种说法，例如以圣人之言为标准，以大多数人的同意为标准，以已有的理论为标准，还有根本否认任何标准的，这里无须一一列举。各派唯物主义都把真理定义为认识与客观对象的符合，在真理定义问题上没有分歧。我们现在的分歧也不在真理的定义问题上而在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上。以什么为标准来判定认识与客观对象的符合。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心。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的唯物主义者也接触到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但那只是偶然的、带有猜测性质的思想火花，并没有上升为哲学的基本命题。其根本原因是旧唯物主义者根本没有科学的实践观，对实践本身的理解是片面的、狭隘的，甚至也不理解检验真理是一种什么过程。他们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来理解实践，无法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不了解实践在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当然也包括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

的标准的作用。他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症结和真正困难。因此，他们在精巧的唯心主义面前软弱无力，留下了可乘之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把科学地界定了的实践作为全部人类生活的基础，才第一次彻底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马克思 1845 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得极其明确：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 [gegenständliche]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经过了 47 年之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不仅没有作任何“修正”，而且作了更详细的发挥。他指出：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又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然后他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也不能确实知道的事物及其特性，而是它们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而已。这种论点，看来的确很难只凭论证予以驳倒。但是人们在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在人类的才智虚构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 页。

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决不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到此时为止，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我们一旦发现失误，总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误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肤浅的，或者是与其他知觉的结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们把这叫作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们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使我们的行动只限于正确地形成的和正确运用的知觉所规定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些在本性上违背现实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①

恩格斯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离开实践来谈论如何判定认识的真理性行不通，驳不倒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2-703页。